

关立丹◎著

武士道

与日本近现代文学

以乃木希典和宫本武藏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武士道

与日本近现代文学

以乃木希典和宫本武藏为中心



关立丹◎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士道与日本近现代文学：以乃木希典与宫本武藏为中心 / 关立丹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004-7831-7

I. 武… II. 关… III. ①文学研究—日本—近代
②文学研究—日本—现代 IV. I31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7655 号

责任编辑 王 茜
责任校对 王有学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6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201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序

王向远*

关立丹老师是日语专家，从本科到硕士阶段都是学习日语专业的，此后一直在日语系任教，已经当了数年的副教授并兼系主任。2002年，她报考了我的博士研究生，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中日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记得她入学考试的日语100分试卷成绩是96分，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博士生的外语考题并不那么容易，然而对她来说那肯定不难。因为她是日语专家。

外语学科的老师，是以教授语言为主的。为了教好语言，不得不涉及语言表现最为丰富复杂的文学作品；为了讲授文学作品，不得不掌握文学批评与文本解读及阐释的基本要领；为了熟悉作家的创作，不得不搞一点文学史的研究；为了搞通文学史，不得不涉猎与文学史相关的历史文化。而一旦悟到这一步，就会感到原来外语学科从语言习得的角度所学习的那些东西，远远不够用了。我在与立丹老师及其他外语学科出身的硕士、博士生乃至博士后研究人员聊天交流的时候，发现很多同学都有这样的感受。

外语学习的本质途径就是“模仿”。对于对象国的言语、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语言，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模仿得越像就越好。于是，外语专业的本科与研究生阶段的论文，就要求用外文来写。中国人用外语来写文章，却须使人从语言使用本身看不出是中国人写的，这是语言模仿的最高的境界。譬如，中国人写的日文，就要像是出自日本人之手。而要做到这一点，连思维方式都要好好“模仿”日本人。这样的“模仿”时间一长，甚至多多少少都会带上语言对象国的那么一点点气质和作派。然而一个人一旦当了大学教师，想做研究者或学者，“模仿”的阶段就该超越了。模仿固然很难，超越模仿更不容易。在学术上一味“模仿”外国人没有出路，到了一定的阶段必须超越。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只有实现了这样的超越，才能自觉强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主体性，才能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与立足点。

我想，立丹老师早就明白了这一道理，所以她才克服种种困难，不愿走轻车熟路，勇敢地跨越了学科，从外语学科来到中文学科。早在报考之前，她在完成北京语言大学日语专业教学与管理的繁重事务之余，经常抽空跑到北师大，到我的课堂上，和学生们坐在一起，从中外文学史，到文学理论、学科理论，如饥似渴地“补”中文系的课。又经过数年的学位课程学习，从而实现了从日语学科到中文及文学学科的跨越。这一跨越是成功的，成功的最终标志，就是眼前这部题为《武士道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博士论文。

《武士道与日本近现代文学》固然属于日本文学史上的课题，但又不是文学通史性的研究，而是“专题”性的研究。窃以为，无论在日本文学史研究领域，还是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那种通史性的研究，或者变相的断代史、阶段史的纵向梳理性的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都很难写出新意，而



“专题研究”则有着广阔的创新的空间，甚至可以填补学术上的空白。像《武士道与日本近现代文学》这样的专题，在日本现有的研究成果未见其有，此前中国学者也没写过。诚然，日本研究武士道的书数不胜数，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史的书汗牛充栋，研究森鸥外、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吉川英治、司马辽太郎等作家的著作俯拾皆是，但从“日本文学与武士道”这样的视角切入日本近现代文学史及作家作品研究的，却很罕见。

《武士道与日本近现代文学》这个选题又带有很强的“问题意识”，那就是研究“武士道”与日本文学的关系。明确的问题意识，可以避免把论文写成作家评论与作品赏析。常常看到国内一些日本文学的学位论文，也模仿日本人写论文的流行模式，把研究论文写成了作家评传与作品评论。那样的题目容易写，但不容易写好，因为它们没有“问题意识”的凝聚点与尖锐度，也就缺乏学位论文应有的理论价值与学术含量。立丹的这个《武士道与日本近现代文学》选题，以其鲜明的“问题意识”，从文学与武士道的关系切入，将日本人耳熟能详，中国人也不陌生的森鸥外、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吉川英治、司马辽太郎等著名作家，呈现出了人们所不熟悉的另一面。诚然，材料大都是从日本收集来的，文本也是日本人的。然而，这些都是为立丹的研究服务的。她的这一研究呈现出了作为中国学者的别样的文化立场与理论视角，不仅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建构，也显示了比较文学专业学位论文的优势和特色。从比较文学方法论上看，这一研究没有局限于日本文学之内，而是将日本的武士道文学与中国的武侠文学、欧洲的骑士文学等做了或明或暗的比较，尽管未能展开，但在方法取向上，是值得称许的。



《武士道与日本近现代文学》这个题目看上去很紧凑很凝聚，却也很大、很复杂，立丹为此花去了至少三年的时光与精力。无奈，涉及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极为丰富，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驾驭。在查阅研读了大量文本资料后，立丹决定收缩范围，于是添了一个副标题——“以乃木希典与宫本武藏为中心”，对正标题做了范围上的限定，以便更有利于操作，也更加文对题。不过，当时选择和设定这个课题，其基本宗旨是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将日本近现代文学与武士道的关系做全面、系统的分析、评述与研究，特别是研究那些为一般的日本文学通史所忽略的、以武士为主人公、从不同侧面表现武士道思想的那些“大众文学”作家的相关作品，从中管窥那些作品所反映的日本作家乃至日本人的精神世界，认识“武士道”在现代日本人精神构造中的位置与作用。从这个角度看，立丹在这部论文中所做的研究，还只是阶段性的，当然同时又是开拓性的。我期望，立丹今后能够在此基础上，将“武士道与日本近现代文学”乃至“武士道与日本文学”这样的课题进一步做下去。也希望这部著作的出版，能为关心这一知识领域的读者，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文本。

2009年6月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明治武士道精神”的缩影	
——乃木殉死	49
第一节 “明治武士道”与乃木希典	49
第二节 乃木希典的形象塑造与“明治武士道”	62
第三节 明治武士道的忠诚写照——乃木殉死	68
 第二章 官僚作家森鸥外对乃木殉死的文学反应	75
第一节 《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的初稿	77
第二节 殉死格式化与《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 的定稿	82
第三节 武士道的逆命题——《阿部一族》	88
 第三章 文学家夏目漱石对乃木殉死的文学反应	95
第一节 官僚作家与文学家的比较——夏目漱石与 森鸥外	95



第二节 “明治精神”——K 的追求与“先生”的罪恶感	98
第三节 先生“殉死”的多重意义	104
第四章 新一代作家对乃木殉死的文学反应	
——芥川龙之介的武士道观	109
第一节 《手绢》与武士道	109
第二节 《将军》对乃木殉死的认识	114
第三节 芥川龙之介武士道观的另一侧面——《某日的大石内藏之助》、《一个敌打故事》	118
第五章 20 世纪 30—40 年代文学中的武士道	
——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	123
第一节 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创作	124
第二节 完美形象——宫本武藏	128
第三节 大众文学《宫本武藏》——善与恶	133
第六章 大众文学与社会	
——《宫本武藏》的社会性	143
第一节 战争与和平	143
第二节 大众文学的“精神因素”	150
第三节 《宫本武藏》的武道修行——“独行道”	157
第七章 现代文学对宫本武藏的再认识	164
第一节 剑的回归——柴田炼三郎与《决斗者 宫本武藏》	167
第二节 换位思考——山本周五郎与《予让》	180



第三节 异想天开——山田风太郎与《魔界 转生》	188
第八章 司马辽太郎眼中的武士道	205
第一节 乃木希典观——《殉死》	206
第二节 宫本武藏观——《真说宫本武藏》	216
第三节 “司马史观”在创作中的体现	223
第四节 “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影响	228
主要参考文献	243
后记	258



绪 论

8 世纪末，随着迁都平安京，将近四百年的日本平安时代（8 世纪末—12 世纪末）拉开了序幕。平安时代共经历了律令政治的改革、摄政、院政、平氏政权等四个时期。经历了初期的安定后，由于土地的开垦，形成了庄园。摄关政治^①造成了庄园的扩大，藤原家族成为最大的庄园主。而随着佛教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寺院不断接收土地馈赠，因此很多大寺院也拥有大量的土地。庄园规模扩大了，便有了守卫的需要。贵族庄园和寺院庄园分别产生了武士与僧兵。武士与僧兵经常发生冲突，于是引发了战乱。平氏家族首先在战乱中掌握了武家政权。但是不久，源氏武士集团不断发展壮大，与平氏集团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即源平争乱。争乱之后，平氏集团衰落下去，源氏武士集团于 1192 年建立了日本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镰仓时代（1192—1333 年）的创立预示着武士与朝廷抗衡的正式开始。之后日本经历了南北

^① 由辅佐天皇担任摄政或关白的人来掌握政治实权的一种政治形式，从 10 世纪前后持续到 11 世纪中期。



朝时代（1336—1392年）、室町时代（1392—1573年）、江户时代（1603—1868年）等，由于武士势力不断增长，实权均被武士掌权的幕府所控制。

长期的武士生活，在武士阶层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道德规范，也就是武士的道德。从镰仓时代开始发展，到了江户时代，武士的道德又被儒教道德所加强，于是形成武士道。武士道强调对主君单方面的忠诚乃至绝对的服从，以尚武、廉耻、刚健为其思想体系，成为封建道德的支柱。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即使是武士道，其内容及理解方式也是在变化的。在这里将主要探讨江户、明治、大正、昭和等不同时代的武士道。

事实上，世界上不仅仅是日本武士，中国的武侠、西方的骑士都是尚武之人。他们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都起着必不可少的独特作用。但是由于他们所处国家的地理环境、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民族特点不同，尚武之人的特点也有所不同。下边让我们在对三者进行比较中进一步认识日本的武士道。

中国的“侠”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后来也被称为“武侠”。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争霸激烈，原有的制度崩溃，旧贵族已经衰微，思想界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为匡扶正义，一些人果敢地使用武力，而不顾所谓朝廷的规范，这些人被称为“侠”。侠曾受到社会的承认。早期的侠为游侠，居无定所，无固定的职业和财产，他们只有投靠别人以食客为生。为报主人之恩，侠往往不顾生命危险，义不容辞地为他人尽职尽责，甚至出现勇于行刺秦王的荆轲等人物。侠在当时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受到一定的尊重。司马迁《史记》中的《刺客列传》、班固的《后汉书》卷九十二《游侠列传》



等作品，对侠都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对“侠”的存在社会上评述不一。法家韩非子批判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既然是对法的违背，就像儒家遭到焚书坑儒的处罚一样，侠也受到了禁止。于是侠在社会表层的位置转移到了社会的背光面，出现了形迹诡秘的隐侠，以至于出现像《水浒传》中所描写的那种占山为王式的人物。侠以打抱不平、见义勇为为宗旨。两汉时期豪侠的出现，使武侠阶层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豪侠的匡扶正义、为民除害，导致了百姓知豪侠而不知官吏的结果。侠从此受到了官府的压制，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上过正史。^①从那以后，侠改为在洒脱中求生存，过着逍遥的生活。虽然如此，后世陆续出现的唐代侠义小说，1614年的《水浒传》及侠义公案小说、武侠小说等等，说明侠士的反叛精神受到占绝大多数的底层人民大众的颂扬，他们的侠肝义胆为大众所崇拜。

与中国武侠地位相对照的是日本武士的统治地位。德川家康掌握幕府政权之后社会进入江户时代（1600—1868年）。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幕府公布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包括对武士地位的确定。幕府规定武士处于士、农、工、商的最前列，他们与农、工、商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界限。

回顾日本的历史，尚武之风可以追溯到比较早的历史时期，甚至在现存最早的书籍《古事记》（712年）与《日本书纪》（720年）的神话中也有所体现。早期的武士只是起到保护庄园的作用，付出辛苦，收取报酬，并没有严格规范的阶级观念和绝对的主从关系。1192年以后，武士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但是镰仓时代、室町时代，武士还没有

^① 兰草：《武魂侠骨》，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



被严格地规范，武士与主君之间大多是一种服务与取酬的契约关系。然而由于感激主君的照顾之情而不惜为主君献身的情形并不少见。

武士政权一直延续至明治维新，前后持续了近七百年。在这七百年的时间里，武士集团不断发展、变化，并逐步形成其独特的武士文化。武士作为日本幕府时期的一个重要阶层，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也是日本精神文化的一种表现，其历史影响延续至今。武士自身的文化与道德规范，被称为“武士道”。横尾贤宗在《禅与武士道》中提到：武士道是自古以来武士之间发展成的一种道德，但是并没有什么名称。到了德川时代才开始称为士道或武道。^①在大道寺友山（1639—1730年）的《武道初心集》中，开始散见有武士道之类的称呼。《广辞苑》中这样解释武士道：

我国武士阶层中产生的道德。从镰仓时代产生，在江户时代糅进儒教思想而集大成。构成了封建体制的概念性主体。崇尚忠诚、牺牲、信义、廉耻、礼仪、清白、朴素、节约、尚武、名誉、友爱。《叶隐》中写道：“所谓武士道，就是死。”^②

西方的骑士与武士一样处于社会的上层。关于西方骑士的形成，克里斯托弗·格雷维特（Christopher Grawett）在《骑士——探寻光荣的骑士道世界》^③一书中提到：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崩溃，很多蛮族侵入欧洲，他们不断扩大势力

① 国书刊行会 1978 年版，第 61 页。

② 1998 年版。

③ 日语版监修：森冈敬一郎，同朋社 1994 年版，第 6 页。



范围，其中最强的当数欧洲中部及西部的法兰克人。公元800年，其领导者卡尔一世成了西欧的皇帝。卡尔大帝和他的子孙们不断增加自己军队中的骑兵，并且给世代代骑马的战士们以土地。但是到了9世纪，这一帝国由于内战加上外民族的入侵而四分五裂。因此，各地骑士转为给有领地的主人提供保护；同时占有土地较少的领主又对更大的领主负有尽诚之责。这些领主以及手下的斗士均被称为骑士。公元11世纪，这些带铠甲的骑士又获得了新的社会地位，他们侍从于伯爵、公爵等地方领主。

骑士的发展使其慢慢成了一种地位的象征，一般的贵族子弟为成为骑士，七岁左右就要到其他贵族家里去学习，甚至14世纪出现保护身体的金属盔甲及面具，重约二十至二十五公斤。盔甲上加进一些装饰，穿戴时需要一定的程序。骑士逐渐形式化。度·皮伊·杜·克兰夏姆（Philippe du Puy de Clinchamps）所著《骑士道》一书论述了骑士道的诞生、形式及衰颓。此书提到骑士道在15世纪法国百年战争末期，由于骑士制度的过分仪式化、仪礼化，已经失去现实意义。但是骑士制度仍然持续到18世纪，随着19世纪的到来和市民文明的胜利，才最终销声匿迹。^①

由于骑士与武士都是隶属于统治集团之下用以保护统治政权的阶层，因此就决定了统治阶级必须用一定的思想道德以及行为规范对他们加以约束，以便加强管理。

那么，日本的武士道具有哪些特征？

首先，武士需要坦然面对死亡。武士必须“尚武”，这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武士道，其最大的特征正像佐贺藩藩士

^① 川村克己、新仓俊一译，白水社1995年版。



山本常朝（1659—1721 年）发表的武士道著作《叶隐》（1716 年）中所指出的那样：所谓武士道就是死。在这里强调的是放弃作为物质的“生命”，追求不怕死的“敌忾心”。“怕死”一般来说是人之常情。武士道超越了人的一般情感，“不怕死”成为真正的武士的最基本条件，不惧生死是对武士的必然要求。武士的自杀方式——“剖腹”，也是武士不惧死亡的一种表现。剖腹于源平之争时期就开始普遍化，在平安时代末期开始也被当作一种刑罚。一般先洁身，跪坐，露出上半身，把刀从左边插入腹部，从左向右划开腹部，成“一”字形。更勇猛的武士则再从上腹部向下划成“十”字形。到了江户时代，为了减少剖腹武士的痛苦，专门有一个被称为“介错人”的人在剖腹者划开腹部之后，把剖腹者的头砍掉。“剖腹”成了武士不怕死的表现。

武士的视死如归究其根源，与禅宗的影响分不开。早在奈良时代佛教就已经传到了日本，但是对武士的生活影响最大的是禅宗。一般认为是荣西（1141—1215 年）把禅介绍到了日本。镰仓时代摒弃贵族文化，严格要求武士节俭并加强行政管理及强化军事力量，他们把禅作为他们的精神指南。经过室町时代，直至江户时代，禅一直受到武士阶层的高度重视，并给日本人一般性的文化生活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

禅与从中国、朝鲜半岛传到日本的其他佛教流派不同，禅讲求“不立文字”，极端反对言语作为中介手段，它以公元 6 世纪由印度南部来到中国的达摩法师为开山祖师，主张回归佛陀的根本思想，8 世纪传至日本。禅的修行方式以佛陀在树下冥想而彻悟的方式为准，提倡坐禅，以此超越言语，寻求最高境界。禅宗使武士通过坐禅断绝了世俗之心，进入无我境界，以此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心理。这是武士在日常的



精神修养中必不可少的。

横尾贤宗在《禅与武士道》^①一书第65页中指出：记录战国时代和江户时代大名以及武士言行的《常山纪谈》（1739年）的作者汤浅常山（1708—1781年），在海上遭遇到暴风，船即将颠覆之际，他却镇定自若，赋七绝诗一首斥退海神。而且，他还在每天早晨吃饭时先把装筷子的长盒子比作短刀，做剖腹自杀的练习。汤浅常山说武士必须做好随时剖腹的思想准备。横尾贤宗还提出：

佛教的宗派很多，其中我们禅宗的宗旨是觉悟于生死之间，心境淡泊、洒脱，讲求清廉，举止严肃而有规矩，生活恬淡寡欲，勇于接济众生，计划周密不畏艰险。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在千军万马中出没，充满杀伐之气的武人才能把它当作养心修身的一大灵药加以向往。^②

武士是一个每天都面对生死的阶层。如何能坦然面对死亡是一大难题，正是禅宗给了武士这样一个解决方法。《叶隐》作者山本常朝的出家，德川家康等幕府将军死后夫人出家为尼的做法，都不能不说是武士阶层受到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的极有力的证明。

禅宗的影响还表现在武士对精神的绝对重视与对物质的寡欲上。新渡户稻造指出：“武士道是非经济性的。它以贫困而自豪。”^③武士把经济、买卖、算账等与金钱有关的事当作是商人的工作，不是武士应该做的，武士追求的是成为

① 横尾贤宗：《禅与武士道》，国书刊行会1978年版。

② 同上书，第66—67页。

③ 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孙俊彦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9页。

